



# 西南古籍研究

(2010年)

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主办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承办

主编 林超民、副主编 古永继 潘先林 何磊 马勇 郑志惠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主办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承办

# 西南古籍研究 (2010年)

主 编 林超民  
副主编 古永继 潘先林 何 磊 马 勇 郑杰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西南古籍研究. 2010年 / 林超民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482-0420-6

I. ①西… II. ①林… III. ①古籍—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6200号

责任编辑: 蔡红华 和六花 / 装帧设计: 刘 弼

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主办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承办

( 2010年 )

主 编 林超民  
副主编 古永继 潘先林 何 磊  
马 勇 郑志惠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31  
字 数: 735千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420-6  
定 价: 60.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顾问：尤 中（云南大学） 杨世钰（云南师范大学） 李孝友（云南省图书馆）

主任：和福生（云南省教育厅）

副主任：林超民（云南大学） 李松林（云南师范大学） 张桥贵（云南民族大学）

邹 平（云南省教育厅） 赵 纯（云南省教育厅）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勇（云南民族大学） 王世丽（云南民族大学） 王胜华（云南艺术学院）

邓启华（思茅师专） 古永继（云南大学） 庄兴成（红河学院）

吴家骏（云南省中医学院） 李 群（大理学院） 陈孝宁（昭通师专）

何 磊（云南师范大学） 杨 磊（文山学院） 郑志惠（云南大学）

段炳昌（云南大学） 钟坤杰（曲靖师范学院） 诸锡斌（云南农业大学）

徐 铮（玉溪师范学院） 章秉纯（云南师范大学） 黎 白（楚雄师范学院）

潘先林（云南大学）

秘书长：古永继

副秘书长：何 磊 郑志惠 马 勇 潘先林

特邀委员：李惠铨（云南人民出版社 副总编、编审） 王水乔（云南省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杜 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刘景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 《西南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任：和福生（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副主任：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

邹 平（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桥贵（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副校长）

赵 纯（云南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

委员：古永继（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高校“古委会”秘书长）

郑志惠（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高校“古委会”副秘书长）

潘先林（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高校“古委会”副秘书长）

何 磊（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高校“古委会”副秘书长）

吴家骏（云南省中医学院教授） 诸锡斌（云南农业大学教授）

王胜华（云南艺术学院教授） 马 勇（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赵 敏（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文 婷（思茅师专教师）

主 编：林超民

副主编：古永继 潘先林 何 磊 马 勇 郑志惠

编 务：娄贵品

## 目 录

|                              |                  |
|------------------------------|------------------|
| 卷首语 .....                    | 林超民(1)           |
| 怀念史念海先生 .....                | 朱惠荣(3)           |
| 从《四夷馆考·百夷馆》概说看方国瑜的史源学 .....  | 张振利(9)           |
| 我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著作           |                  |
|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 .....           | 曾黎梅(16)          |
| 明儒张志淳绘画艺术之成就 .....           | 刘景毛(23)          |
|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视野下的云南风物 .....      | 江 燕(29)          |
| 王恕巡抚云南奏议 .....               | (明)王恕撰 年四国点注(37) |
| 裴宗锡及其《滇黔奏稿录要》 .....          | 邹建达(62)          |
| 《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 .....         | 秦树才 梁初阳(75)      |
| 余庆远在维西的考察与《维西见闻纪》 .....      | 姚艳伟(87)          |
| 一个满族官员在云南辛亥革命中的命运            |                  |
| ——崇谦《宣滇日记》概说 .....           | 潘先林 杨朝芳(98)      |
| 尹明德与《宣慰日记》 .....             | 董晓京(109)         |
| 彝文文献史料的年代问题 .....            | 街顺宝(116)         |
| 解析《滇海虞衡志》的指导思想:“国计民生” .....  | 张 雷(147)         |
| 从历代王朝对贵州的经营变化看明清《贵州地理志》的记载内涵 |                  |
| .....                        | 马国君 李 伟(165)     |
| 《清史稿·土司传》解题 .....            | 高国强(182)         |
| 《岑襄勤公奏稿》入越抗法史实补证             |                  |
| ——1883.9—1884.10 .....       | 梁初阳(193)         |
| 留日学生的社会改良思想初探                |                  |
| ——以《云南》、《滇话》为中心 .....        | 周立英(218)         |
| 研究 1908 年河口起义与中法交涉的重要史料      |                  |
| ——档案“河口起义前后的清政府与法帝国主义”述略     |                  |
| .....                        | 陈元惠 马俊林(227)     |
| 《滇缅铁路月刊》与滇缅铁路的修筑 .....       | 姚 勇(234)         |
| 《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的史料价值 .....       | 李 燕(250)         |
| 《西南边疆》关于边疆教育的调查研究 .....      | 娄贵品 曹 曦(256)     |

|                                                                                        |              |
|----------------------------------------------------------------------------------------|--------------|
| 《边政公论》有关云南研究述论 .....                                                                   | 段金生(264)     |
|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瑶族调查手稿述评 .....                                                             | 萧霁虹(271)     |
| 中苏协定与云南农垦早期发展历程 .....                                                                  | 文 婷(280)     |
| 云南内地土改中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件概说 .....                                                             | 张黎波(290)     |
| 明人别集云南篇目跋 .....                                                                        | 朱端强(300)     |
| 清代辑佚成就述论 .....                                                                         | 李慧慧(310)     |
| 云南古代诗话提要 .....                                                                         | 冯良方(322)     |
| 明代云南方志的历史地理考察 .....                                                                    | 钱秉毅(329)     |
| 清末至民国法文云南游历著述书目叙录 .....                                                                | 杨 梅 许 涛(344) |
| 元代云南行省史料编年 .....                                                                       | 田 玲(352)     |
| 明、清、民国云南霜灾相关史料编年 .....                                                                 | 濮玉慧(395)     |
|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的西南史料 .....                                                               | 许新民(408)     |
| 安健《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校注 .....                                                                  | 秦 亮(413)     |
| 民国时期昆明华亭寺的档案资料整理 .....                                                                 | 谭丽琼(427)     |
| A Report on the Survival and Use of Pāli Texts among the Dai of Xishuangbanna<br>..... | Yao Jue(460) |
| 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档案遗产流失保护研究 .....                                                              | 华 林 陈文娟(464) |
| 方国瑜对民族档案史料学的贡献 .....                                                                   | 陈子丹(469)     |
| 承载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类别研究 .....                                                        | 谭莉莉(477)     |
| 附 录 《西南古籍研究》总 1—7 期目录索引 .....                                                          | 古永继 编录(484)  |

## 卷首语

林超民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天下之时，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天下公认。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体，中国文化也在日益显现出强劲的活力与巨大的魅力。因为古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必须认真发掘、整理、研究中国古籍。离开古籍，离开古籍整理与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句空话。只有通过整理与研究古籍才能发掘、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时常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文明、西方科学技术涌入古老的中国之时，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国人面临的大问题。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连中国的文字也不要了；有的人则死守中国固有传统，不思变革。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人则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历史证明，“全盘西化”走不通，死守“传统”不思变革也不行。一百多年来，中国就是在两种极端的争论中，走着曲折、迂回、艰难的道路，摇摇摆摆地在“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间摸索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新路来。这就是，不抛弃传统，而是认真“整理国故”，弘扬精华，扬弃糟粕；不排斥西学，大胆向西方学习，借鉴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思想方法，抵制那些不适合中国的污泥浊水。

20世纪50年代从批判胡适开始，既否定向西方学习，又反对传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破旧立新”、“灭资兴无”的文化虚无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高潮。三十年间，我们闭目塞听隔绝于国际文化之外，又割断了与自己传统连接的血脉。

犹如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思变并出现“戊戌变法”导致一系列“新政”一样，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犹如20世纪前十年，梁启超、章太炎等创办《国学报》，发起“国学讲习会”，成立“国学振起会”掀起振兴“国学”的热潮一样，21世纪开始的前十年也出现了新的“国学热”。与20世纪初热血青年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同的是，本世纪初我们恢复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尊孔、学孔、拜孔与摇滚乐、好莱坞、时装秀、哈利波特一样成为时尚。孔子还走出了国门，世界各地纷纷兴办“孔子学院”。

尽管历史发展不时出现相似的情形，但历史毕竟无法重演。西方文化的刺激促使国学振兴，同时也使复兴的国学借鉴、吸取西方学术的理念与方法。与历史上的汉学、宋学、乾嘉考据学相比，20世纪初期的国学研究，不仅观念大为不同，而且方法也更加

科学化、系统化，将中国传统学问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依靠历代文献，详尽占有原始资料，从资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整理、分析、研究，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对古籍的广泛收集、深入发掘、细致分析、认真研究，逐渐建立创新的理论体系，进而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学术的发展轨迹有科学的认知，理性地面向未来，做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我们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只有具备这种理论自觉，才能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对世界文明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不是百十个学者，也不是一两代学者所能完成的工作，需要成千上万的学者、世代代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坚毅不辍地辛勤工作。因此，培育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青年学者就显得格外重要、殊为紧迫。

十分高兴地看到，新一代的古籍整理研究者正在茁壮成长，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本卷的作者大半是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80后、90后的“新生代”。

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相似现象”。在20世纪“整理国故”的年轻学者陈垣、章士钊、鲁迅、刘师培、刘文典、陈寅恪、胡适、郭沫若、吴宓、钱穆、冯友兰等就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他们大多通过“整理国故”成为20世纪的“国学大师”。

我们有理由相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一定能够在古籍整理与研究中做出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21世纪的“国学大师”。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提倡国学、弘扬国学的新时代，他们不仅有和谐、自由的学术环境，而且有宽松、良好的研究条件；他们不仅有系统、扎实的传统学术的功底，亦有开阔的眼界、活跃的思想、新锐的见解；不仅有校讎、考证的功夫，而且有电脑、网络等技术。这些都是前人所不可比拟的。如果不能在前辈的基础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就要愧对古人、愧对时代、愧对后世了。

古籍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冷清、寂寞、细致、迟缓、艰难、无名、无利的“边缘性”工作，但又是许多“热门”的“中心”大业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苦读于寒窗之下，甘心情愿地坐定冷板凳，不为功名所动，不为富贵所惑。唯有如此，才能在“边缘”做出有益于“中心”的业绩。

我们年轻的学者，能够在浮躁、功利的环境下，静下心、沉住气，认真做好古籍整理与研究，正是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先兆。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为时代作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当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学者在古籍整理研究上起步并做出不俗不凡的成绩的时候，在满怀欣慰之情的同时，不禁为他们将成为领一代风骚的学者心情满溢期盼。

#### 作者简介：

林超民，博士，云南大学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 怀念史念海先生

朱惠荣

史念海先生生于1912年6月，山西平陆县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早年，先生参加禹贡学会，常在《禹贡》杂志上发表文章，与顾颉刚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先生的另一部专著《中国的运河》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局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思如泉涌，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出版了历史地理的系列论集《河山集》。史念海先生对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黄河流域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不单研究黄河下游的河患，更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中游水土流失的情况；对黄河中游的环境变迁，既研究自然地理方面的侵蚀、切割，又研究森林、植被、农业、蚕桑的变化；对黄河及其引起的环境变迁，已从定性的描述逐步走向定量研究。史念海先生的另一研究重点是古都学方面。在他的倡导和筹划下，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成立。史先生作为会长长期领导中国古都学会的工作，坚持每年召开学术年会，出版《中国古都研究》会刊，他自己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并结集成《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都大大推动了全国各古都的研究。史念海先生也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开拓者。20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军区遵照上级指示，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同志参加，于1972年出版《陕西省兵要地志》资料集。不久，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指示，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系统翔实的《陕西省历史军事资料》，于是成立了以史念海先生为主，西北大学地理系的田泽生、李健超、李之勤等老师参加的编写组，此后几年，在陕西各地和周边相邻省区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后来收入《河山集》第四集。

史念海先生的学术贡献还有地名学和历史文献学。这两方面时贤论说较少，但却是我参与并亲聆教诲的内容，回忆起来犹如昨日一样新鲜。

1979年，我国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地名普查，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接着又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的编纂。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都被礼聘为这项工作的学术顾问，对地名的研究一时成为历史地理学界关注的热点。史先生满腔

热情，身体力行，带头进行地名研究，率先写成《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的论文。先生站在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度，认识到整理我国固有的地名，探讨其命名的规律，对于实现我国地名标准化和今后的地名命名更名，都可提供借鉴。先生以陕西为例，从县名入手进行探讨。陕西省当时共设5市92县，加上历史上改名和废置的旧县，共达500多个，按其命名方式不同，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分为14项，有关人事方面的命名分为11项，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发现古今县的命名是有一定规律的，而以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方式比较见长，因山因水的命名方式，在普遍性和稳定性方面就更显得突出。先生又积极推动全国的地名研究，计划每省一篇，结集出版。经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推荐，史先生在1980年8月4日来信邀我参加这一工作，并附寄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文章作为样稿。信中说：

前由谭季龙先生处，得闻您精研西南历史地理，颇多创见，无任钦慕之至。

当前各省已在进行地名普查工作，对于全国地名要进行一番整理。海于去岁草撰一篇《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曾在一些同志之间传阅。大家认为如果能将全国各省县名命名规律探索出来，对于当前地名的整理工作当有所帮助。地名委员会也对此多所鼓励。因邀请各方同志共同努力。目前计划编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书，拟将此项论文作为一辑出版。为此热请撰写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县名释名，当然包括古今所有的县在内。

史念海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辈，其学术成就和道德文章，久已为我所崇敬。先生的盛情，这项工作的意义，都使我动心。当时我任云南省地名委员会顾问，云南的地名普查工作正逐步展开，随着民族语地名识别工作的推进，云南的地名研究将会发生突破，很多古今县名的语种和含义发生了变化，也出现了新的争议，要全面总结古今云南各县的命名，条件尚不成熟。虽先生多次催稿，迟迟未能应命。1985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集出版，作为历史地理学界对地名研究的回应，倾注了先生的心血，所收论文涉及15个省（区、市），已近全国半数的地域，作者亦达15位。先生为此书写了序，以《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讨》为题发表。先生高屋建瓴，对正在兴起的地名学热情讴歌并寄予厚望。先生说：

地名学也和历史地理学一样，终于各自独立成为一门学科，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学性更益显著。这在我国尤其是如此。……直到现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还止限于提出其研究成果，供有关方面的采用。可是国家已在其组织机构中设立地名委员会，对于地名工作进行管理和改革，这就需要地名学的研究者提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国家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历史地理学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各方面都日益显示出其作用，地名学的作用较之历史地理学可能还要显著，而且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先生又说：“有关地名学这样的论证和对于若干规律性问题的探讨，还只能说是开

始，而不是结束。……对于地名规律性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推动地名学的研究，也可以有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这是对学界积极投身地名学研究的动员令。捧读先生寄赠的大作，精神振奋，决心沿着先生的指示继续努力。

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史念海先生的两封信，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先生对后学的奖掖使人感怀。

先生1986年初赴京开会，1月17日在北京香山饭店给我写信，表扬《徐霞客游记校注》本的优点，并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卷的编纂。信中说：

尊著精详细致，为表彰徐霞客尽力不少。当前有关《徐霞客游记》已陆续有所印行，但能像尊著这样雅俗共赏的还未能多见，尊著有功士林，实为难得。

承示正在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卷，欣喜无已，甚望能得先读为快。

以后我全力以赴投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的编纂工作中。史先生作为该书总编委会的学术顾问，对各卷的质量都十分关心。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1996年收到了先生的又一封鼓励信：

惠荣先生史席：

年初远承惠书，并承寄云南省的《地名词典》，稍后朱士光先生由沪上开会归来，又荷致意远念。隆情厚谊，感篆无已。

云南省词典业已拜读。以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其他各省部分相比照，允为上乘，具见钻研功夫，敬佩实深。云南为多民族杂处的地区，各民族各有其习俗惯例，命名规律亦难得一致。此在新疆、青海、内蒙各省区也是一般皆有的现象。云南民族多，当更为复杂。如能从各民族命名的本来涵义探索其间命名的规律，应为一时创举。未知先生亦有意乎？

十年前，海亦曾远游至于西南，更远至于大理，深知云南省许多地方无四季之分，令人念慕无已。此间久阴，近始放晴，杂花才生树间，遥想云南杜鹃早已开遍山间与平原。尊驾久居其地，亦是特有的福分。有此福分，有此学力，诚为他人所难企及。海孤处秦岭以北，不能相比，然能得读鸿篇巨制，亦是一种福分。谅先生亦当首肯此言也。

揣此，顺颂

著绥

史念海拜上

四月廿一日

史先生对云南的赞美，使每个云南人都会升起自豪感，这是天时地利。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的肯定，是老一辈学者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先生独具慧眼，从该卷中的大量民族语地名资料，提出总结民族语地名命名规律的新课题。先生十多年前给我出的题，迟迟未能交卷，心常歉憾。经过这些年，地名普查、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早已结束，各县地名志陆续编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

出版后,我贾其余勇,完成《云南民族语地名研究》,在1997年和1999年出版的《史学论丛》第6、第7辑上连载,算是在地名学方面给先生交了一份完满的答卷。

史念海先生也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顾问。先生早年就读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先生打牢文献学和考据学的基础,获得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表扬。又襄助张国淦先生撰述《中国古方志考》,对古籍和方志颇多研发,后来与曹尔琴先生合作,出版《方志刍议》。谭其骧先生称赞史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先生稔熟历史古籍并长于考证,利用考据学的方法,把历史文献与野外踏勘调查掌握的地理实际比对,复原地理环境变迁的巨细痕迹,推动了历史地理研究。

先生晚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改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创编《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但所收书目要比《四库提要》多得多,清末以前的古籍尽行搜罗,工程浩大。全书分若干卷,各卷由主编负责,组织参编人选,落实书目,并试写样条。1997年初夏在宁波召开编委会,讨论并确定各卷试写的样条。《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地理卷》请史念海先生担纲主持。经初步调查,地理类古籍包括域外部分,共2200多种,还不包括地方志(地方志另为一卷),工作量很大。2008年2月,先生给我来信如下:

惠荣先生著席:

数承赐寄大作,已皆依次拜读,受益匪浅。只是未能早日奉陈芜笺,略表谢忱,为歉良多。

兹有陈者,有庶事一宗,敬祈将伯之助。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创编《古籍提要》,其体例略同《四库全书提要》。清末以前的古籍皆在撰写之列。已计划创编若干卷,其中地理卷,着海集组人力,共同致力。已查出此项古籍多至两千两百种,工程浩大,深盼大力共同撰写。

初步安排,地理古籍如此之多,只好先搜集手边现有之书,分头撰写,其不易找到的,以后再说。参加撰写者,各就当地能取得的古籍,开出书名单,汇集海处,按提出的先后,依次排列,先提出者先写,后提出者就须另提。如上所说,地理古籍如此之多,自难一时皆能提完,只好先提若干种,以后再随写随时另提。有关西南舆地古籍当为数亦殊不少,可以从容撰写。据说顾炎武《肇域志》,只有昆明有藏,应是海内珍本。其他古籍珍本,谅亦丰富。

提要篇幅,据编委会规定,分1200字、1000字及800字数种,各依所据的撰写的古籍而定,鸿篇巨制,还可有所增加。当此项工作初创之时,编委会曾着海先行撰写若干条,由他们斟酌修改,即以其中五篇作为样稿。如荷俯允,当将此诸篇奉上,敬祈指正,亦权作参考。

翘望南天,敬盼好音。

崑此,顺颂

台绥

史念海拜上

二月九日

有关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我的所好，从《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到《肇域志》的整理，旷日持久，几无间断。我还把这些书作实例，给研究生开“历史地理要籍整理”课，教年轻朋友掌握古籍整理的方法。能在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参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重点项目，当然也是我之所愿。此后，史念海先生和我对编撰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史先生提出：“有关西南方面的地理古籍甚多，且多为内地所不经见者，甚盼能在这个方面多费心力。”“我辈多下些工夫，至少不落于《四库》之后，也许还能有超过之处。”充分发挥地区古籍收藏的优势，力争超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水平，成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根据列目的原则，凡各家书目中地理类列有的书目，在民国以前者皆行收入，一律撰写提要。我提出，已佚的古籍，若后人辑本，作为我们这一代对古籍掌握和认识的汇总，应该收入《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内容与地理有关，但可能算不上标准的地理类古籍，能否把口径放宽些。诸个想法都获得史先生赞许，“古籍书目应放宽，尊论甚是”。通过讨论书目，增加了一批乾隆以后形成的古籍，特别是近年新发现的古籍。按照要求，“提要内容大致仿《四库提要》，而稍有增损。先叙作者生平，次述原书的大致内容，再次为对于原著的评价，最后详举所有版本”。写作中涉及诸书虽过去读过，但不敢凭记忆随便动笔，又认真重新温习。古人和时贤的评论，也必须一一检核，对每种书尽可能给以科学准确的评价。为落实版本情况，花的工夫最大，不但尽量搜罗各种版本，还要评价其质量优劣，我想这是对后来者最有用的线索。在写作中，对有关古籍的书名、作者、内容、结构、流传情况等都进行了核查和审订，判断其真实情况，不人云亦云。那几年，在史念海先生的领导下，我一心投入《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地理卷》的工作，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后来我承担的工作全部完成，1999年和2000年分两次挂号寄给了史先生。

1998年10月和1999年9月史先生的两封信反映了先生晚年的工作情况和精神境界，特全文录出，以飨读者。

惠荣教授史席：

大札奉悉。暑假虽是休息之时，却难于减少若干琐事。海在此亦是如此。既参加会议，就须发言，就须写发言稿，多费时日，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承示本学期课程不多，将把主要力量放在《古籍提要》上，为之欣愉不置。提要工作应撰写的甚多，只能努力为之。作为舆地之学，这项工作实居重要地位，《四库提要》之所以为世所重，亦在于此。我辈多下些工夫，至少不落于《四库》之后，也许还能有超过之处。

揣此，顺颂

台绥

史念海拜上

十月八日

惠荣教授道席：

长夏酷暑，未敢多事烦扰，亦少问候安宁，为歉！

兹奉上拙著《河山集》六集壹本，敬请指正。以前所出各集，以手边已无存书，未能一并奉上，至以为憾！

当前已过处暑白露，较为凉爽，未悉《古籍提要》进行情况，便中烦一示知，亦可转告总编纂处。

近年来，由于写作任务繁重，每日都在执笔写作，目力渐弱，两耳亦复重听，真可谓老之已至，亦无可奈何也。

瞻望南天，伫候佳音。

肅此，顺颂

著祺

史念海拜上

九月十一日

史念海先生老骥伏枥，志存高远，认真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努力争取超越。先生社会工作繁忙，但总是认真投入，充分准备。先生毕生勤奋，直到晚年，视力衰退，两耳重听，仍坚持“每日都在执笔写作”，笔耕不辍。先生的言行，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踏实的工作态度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2000年下半年在云南大学召开“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获悉史念海先生患病卧床，甚感意外，心中叨念着祈望先生早日康复，并奉函慰问。更意外的是，几个月以后我同时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朱士光教授写的，通报学校拟于4月下旬提前为史先生举办90华诞庆祝会，欢迎著文并参会。另一封是陕西师范大学的讣告，就在朱先生写信的第二天，即2001年3月27日，史念海先生与世长辞。我该参加什么样的会呵，几乎使人不敢相信。

一年多以后，我在书店偶然见到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这是在史先生逝世后见到的先生著作行世，亟为购下。该书有史念海先生2000年2月写的长序，详述了先生考察黄土高原的历程，十分难得。该书的后记写于2000年6月1日，可能是先生病前的绝笔。捧读大作，又想起我发出的唁电：

先生的事业不朽，

先生的成就永传。

#### 作者简介：

朱惠荣，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 从《四夷馆考·百夷馆》概说 看方国瑜的史源学

张振利

对考寻史源，陈垣先生有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sup>①</sup>。方国瑜先生作为陈先生的及门弟子，将史源学方法运用到云南地方文献的研究中，在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陈先生所开创的史源学。限于多种因素，他本人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然而，《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的每一篇概说几乎都可视为他运用史源学方法进行文献研究的典范。基于此，本文选取《四夷馆考·百夷馆》概说为研究个案，在重新梳理《四夷馆考》版本流传及内容的基础上，从史源学的角度对方先生所引证的资料、得出的结论进行回溯性研究，最大限度地再现方先生运用史源学方法进行文献研究的过程，对他所得结论的可商榷之处进行着重考述，进而总结其史源学的特色。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对《四夷馆考》最早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是向达的《瀛涯琐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发表于1940年《图书季刊》新第2卷第2期，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方国瑜“承觉明先生之盛意，假手抄本读之”，“犹有余意为觉明先生所未言者”<sup>②</sup>，因此写成《跋王宗载〈四夷馆考〉》，发表于《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3号。后收入《滇史论丛》。随后他将《跋王宗载〈四夷馆考〉》改造为《四夷馆考·百夷馆》概说，先后收入油印本《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十八辑、《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云南史料丛刊》第5卷及《方国瑜文集》第四辑。近年来，学界刊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张文德《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一文<sup>③</sup>。该文在向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内容涉及王宗载的生平、成书时间、写作目的及《四夷馆考》的流传等。但是，

① 《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② 方国瑜：《跋王宗载〈四夷馆考〉》，载方国瑜《滇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③ 张文德：《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

作者丝毫没有提及方国瑜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一、《四夷馆考》版本流传及内容

清初，钱谦益、黄虞稷、钱曾三家的书目著录了该书。《绛云楼书目》卷一“地志类”著录《四夷馆考》九册<sup>①</sup>，与《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四夷馆考》九册相同<sup>②</sup>。钱曾的三种藏书目均有著录。据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书目汇编》，《也是园藏书目》卷三属夷著录《四夷馆考》二卷，《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卷三外夷著录《四夷馆考》十卷一本，抄。《读书敏求记》别志著录王宗载《四夷馆考》二卷<sup>③</sup>。

向达所见《四夷馆考》的版本有二：（1）巴黎本。上钤有“翠竹山房”、“子桂氏”、“李梦虞印”、“时雍”、“李攀之印”诸章。（2）黄陂陈士可抄本。上有陈氏题记：“此明叶向高著《四夷馆考》，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在京师借曹中书君直藏本，托冒鹤汀弟倩工抄得。曹藏亦抄本，得自王文敏家。”陈本末罗叔言（振玉）题：“《明史·艺文志》‘职官类’有汪俊《四夷馆考则例》二十卷、《四夷馆考》二卷。此或即汪氏书。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寒中借观并题记。”<sup>④</sup>1924年东方学会排印本《四夷馆考》后有罗振玉光绪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的题记，所得结论大致相同。

由以上的著录题跋，结合藏书章，可对《四夷馆考》的抄藏作如下的推断：《四夷馆考》曾被明末清初的钱谦益、黄虞稷、钱曾收藏，又经翠竹山房及顺、康时期的李梦虞（时雍）、李攀（子桂）等人之手。该书在清康熙以前的传抄流传线索非常明晰。康熙时或以后有一抄本流入国外，被 G. Deveria 收藏，后归巴黎东方语言学校<sup>⑤</sup>。留存于国内的抄本在康熙以后的流传情形变得扑朔迷离，直到光绪末年才再次现身。经王懿荣（谥文敏）、曹君直（元忠）、陈士可、罗振玉等人的辗转传抄，最后被罗振玉于1924年刻入《东方学会丛书初集》。

现存国内的《四夷馆考》有两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政书类”著录《四夷馆考》二卷，清抄本，曹元忠跋，一册，页九行，行十六至十九字，无格<sup>⑥</sup>。现藏国家图书馆。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十三“史部政书类”及翁连溪编校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政书类”著录，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本《四夷馆考》的清

①（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清嘉庆二十五年刘氏味经书屋抄本，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9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②（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③（清）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目录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④ 以上陈氏、罗氏题记，均引自向达《瀛涯琐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载《图书季刊》新第2卷第2期。

⑤ 据向达介绍，“巴黎本，红格抄本，今藏东方语言学校，原属 G. Deveria 藏书，编号 D—68—17”。参见向达《瀛涯琐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载《图书季刊》新第2卷第2期。

⑥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61页。

抄本<sup>①</sup>。

清初钱谦益、黄虞稷、钱曾所藏《四夷馆考》是否为刻本，已不得而知。但《四夷馆考》的内容被收入他书而得以刊刻的情况是存在的。研究者都注意到清康熙年间江纂编的《四译馆考》，张文德明确指出该书“所记明朝各馆的内容，基本照录了王宗载的《四夷馆考》”<sup>②</sup>。此外，明章潢编的《图书编》也收录了《四夷馆考》的内容，却没有被人提及。《图书编》于万历五年（1577年）至十三年（1585年）间完成，在明代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天启三年（1623年）两个刻本，后收入《四库全书》<sup>③</sup>。

《图书编》卷五十《外四夷馆考总叙》即是对王宗载《四夷馆考序》删改而成，主要是掩盖王宗载自述性口吻<sup>④</sup>。《图书编》删去了“余承乏提督”、“顾余不敏，不能为役，过不自量，创为此编”等第一人称的语句，王宗载的落款更是首当其冲。

巴黎本出自清抄，限于政治环境等因素，清人删改字句以自我保护。从避讳中可以体现出来。如“猷虑甚弘远也”，巴黎本改“弘”为“宏”。再如“今上嗣历之六年”，巴黎本删“今”字以掩人耳目。因此，明刊本《图书编》更能反映《四夷馆考》的原貌。二者对照，明刊本《图书编》有明显优于巴黎本之处：如“殆今二百余年，曩之遗老尽矣。官师之所肄习者，即语言文字，尚不必该贯，况其他乎”。“必”，明刊本《图书编》作“能”。再如，“俾初学之士，时有所考，以知夫彼国之委悉，庶于译学不无小补耳”。“时”，明刊本《图书编》作“得”。从文义上，“尚不能该贯，况其他乎”，更能加重感慨的语气。“得有所考”比“时有所考”更能体现王宗载编撰此书的目的。当然，以上的校勘须建立在发表于《图书季刊》新第2卷第2期上的《瀛涯琐记》中的《四夷馆考序》与向达手抄本一致而无文字排印错误才有意义。

由此可以推断，王宗载《四夷馆考》于万历八年（1580年）成书后不久，内容就被收入《图书编》得以刊刻流传，而《四夷馆考》之名则湮没不彰。尽管如此，明刊本《图书编》较好地保存了《四夷馆考》的原貌。四库本《图书编》则又经过了馆臣的篡改。如改“历”为“服”，改“鞑靼”为“鞑靼”，改“丑”为“各”，改“俺酋”为“谙达”。相较明刊本而言，不能引以为据。《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十四辑收入《图书编》六则，包括“沿革”、“入滇之路”、“控制云南”、“议开金沙江”、“兴农桑”、“处置”。遗憾的是，这些资料转录于王崧《云南备征志》卷七，使方先生与《图书编》中所收《四夷馆考》的材料失之交臂。

① 中国古籍善本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2页；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647页。

② 张文德：《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考章潢年谱，乃称万历五年丁丑《论世编》成。又称万历十三年乙酉出《图书编》与邓元锡《函史》相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卷一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5页。

④ 以后所引王宗载《四夷馆考序》均为向达《瀛涯琐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一文所载，不再注明出处。